第一章

显学之圣

墨子，春秋战国之交的大师级人物——『世之显学，儒墨也』，墨家曾与儒家并驾齐驱了几个世纪——『以墨为道』，墨道反映着『贱人之所为』——墨子一生『无君上之事』，一直是个『贱人』，所谓『宋大夫』云云，纯属子虚乌有——墨子是个学问家，他与弟子共著了被时人称为『良书也』的《墨子》一书——墨子之后，墨学一分为三，继续『显荣于天下』，直至秦汉之际

客问：说来有趣得很：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无论哪个家派的代表人物，对他们所持学说，当世和后世虽评述不一，可对他们姓甚名谁却无甚争议，唯独对先生的尊姓多所置疑。较早提及先生姓氏的是韩非子，他说：“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写《史记》的司马迁说“:盖墨翟,宋之大夫。”(《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两人都认为先生姓墨名翟。时间过了一千多年，元代有个叫伊世珍的就提出质疑，认为墨子不姓墨。清代的周亮工在《因树屋书影》中明确认为先生是‘以墨为道”,其实并不姓墨。而后,顾实之的《汉书艺文志讲疏》、陈柱的《墨学十讲》、钱穆的《墨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皆从此说。当然,还是有人认为墨子姓墨的,如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一书中就认为“:墨子,名翟,姓墨氏。”并引述古有孤竹国君墨胎氏,后有墨姓人为证。这样，先生的“姓”的问题成了一桩莫衷一是的历史公案，不知先生有否兴趣加以澄清，并给世人以一个说法？

答问：应当说，这是一个饶有兴味和很有价值的议题。一般说，姓甚名谁，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字符号，不是件怎么了不得的事。但一个“墨”字，一旦与我带领的这个学派的精神实质和行为趋向联系在一起，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我很欣赏“以墨为道”这种提法，“墨”中有姓，“墨”中更有‘道”。

我的答案有点两可，但意思还是清楚的：“墨”不是姓，但也是姓，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理解。

说“墨”不是姓，那是从原本意义上讲的。古代人对人的肤色很注重，“墨”原本讲的就是一种肤色。我墨子和我的门徒整天在外面奔波，风里来，雨里去，面目墨黑，那是势所必然的事。请读一读下面两段文字，就可清楚了。一段是记述我的行踪的：“子墨子北之齐，遇日者。日者曰：‘今日帝杀黑龙于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听，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贵义》）意思是说，我墨子要到北方的齐国去，遇到一个占候卜筮的人（日者），对我说：眼下上帝正要杀死黑龙于北方，你先生肤色黑得很，不可以到那里去。我墨子没理会那一套，迳然北行，但事情没办成。这里有两点很值得引起注意：一是日者说‘先生之色黑’，说明我不只脸膛黑，而是通体皆黑，这样才可名之为‘色黑’。二是日者把我喻之为‘黑龙’，这正好与‘墨’字相影射。另一段文字是记述我的一位大弟子的：“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备梯》）是记禽滑釐跟随我三年，手掌和脚心就都长满了老茧，而脸变得墨黑墨黑的。师事我三年已经‘面目黧黑’了，如果师事五年，十年，二十年呢？那不更是黑而近墨了吗？一大群“面目黧黑”者一起进进出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面孔黑、体肤黑，久而久之，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指着我们说：‘看，这群黑子，一批黑人！’我在自己的书中，也用了‘黑子’‘黑人’这个字眼（《经说上》），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

有人会说，你这里只说到‘黑’‘黧黑’，并没讲到‘墨’呀！其实，黑、墨在我国文字里历来是相通的，尤其在谈及人的肤色时，人们常以黑代墨，或以墨代黑。《左传·哀公十

三年》“：肉食者无墨，今吴王有墨。”杜预注“：墨，气色下。”意思是说，有钱有地位的人（肉食者）脸色是不会呈墨色（黑色）的，现在吴王脸有墨色，可能有病。汪中《哀盐船文》：“死气交缠，视面惟墨。”意为人到了病势沉重时，面色往往像墨一样黑。可见，黑与墨的确是相通的。人们称我们这些“面目黧黑者”为“墨者”，称我为“墨子”（墨先生）也就不奇怪了。

至于有人说到的“以墨自命”，有那么一点道理，但并不全面。按情理讲，首先是别人呼我和我的弟子们为黑子、黑人、墨者，而我们不以为耻，认为这样称呼没什么不好，认可了，甚至以“墨”自称、自许。这是一个过程。

问题可以往更深一层想。

面目黧黑，面目白净，可以是一种自然的肤色的分野，但是，从社会意义上讲，面目、肤色又代表着人的一种生活和生存状态。史书记载“：舜黴黑。”（《淮南子·修务训》）舜是圣人，他整天忙忙碌碌，脸哪能不黑？苏秦“形容枯槁，面目黧黑”；（《战国策》）苏秦要游说诸侯，周游列国，脸黑也是必然的。我在自己写的书中指出，那些受苦的人，必然“面目陷曒，颜色黎黑”（《节葬下》）；“有黎黑之色”（《兼爱中》），而面目白净、养得白白胖胖的，则代表着另一种生活和生存条件。我在自己写的书中曾指出，那些“面目美好者”（即白净者），不是“王公大人”，就是“无故富贵者”（《尚贤下》）。可见，面目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

这里有了一个升华，即承认自己是“墨子”“墨者”，不只是不少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承认自己的体肤之黑，是一个名号问题，而从根本上讲是对黑色体肤者的一种出自心灵深处的认同。这里说的“黑色体肤者”是一个社会的群体，

社会的层面。韩非子有言:“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劳有功者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荀子以为:“有人于此,夙兴夜寐,耕耘树艺,手足胼胝,以养其亲。”(《荀子·子道》)可见,面目黧黑者、手足胼胝者,代表着社会上劳者、功者、养者这个层面。再说,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史记·夏本纪》)黎,通黧,即为黑,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黎民百姓也是以肤色为标记的,黎民者,肤色黧黑之民也。这样看来,我的“以墨自命”“以墨为道”,就是为黎民百姓之“道”服务的。我墨子除了为黎民尽功利外,没有一点个人和自己集团的私利。

“墨”原本不是姓,还有一有力的佐证。先秦诸子,没有一个以姓为学派名称的。孔子所创导的学派不叫孔家,而叫儒家;老子所创导的学派不叫老家,而叫道家;韩非创导的学派不叫韩家,而叫法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谓儒、道、法,都点明了这一学派的本质,这一学派的思想观念要旨。如果我墨子姓墨,岂不独独是我以姓为学派名称了吗?事实很清楚,“以墨为道”的解释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宣扬、履行的是百姓之道、贱民之道、黎民之道,总而言之,称之为墨道。由此而称为墨家,就讲得通了。

在诸多学者文人中,较能理解“墨子”这一名号者,当首推冯友兰先生了,他在《中国哲学史》上册中指出:

> 墨子所主张者为“贱人之所为”,此其所以见称为墨道也。然墨子即乐于以墨名其学派,此犹希腊安提斯塞厄斯(Antisthenes)之学之见称为“犬”学,而安氏亦乐于以此名其学,死后其墓上刻一石犬以为墓表也。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了:我从本来意义上讲并不姓墨,“墨”是我与我的弟子的肤色特征。人们以此

特征加外号于我,称我为‘墨子’(黑先生),称我的弟子们为“墨者”(黑人),正像英布系一黥徒,被人加上黥布的外号,而司马迁为之作《黥布列传》一样。久而久之,我的本姓倒因无关大体而被人忘怀,以至于成为一历史的永久的疑案了。‘墨子’这一外号并无恶意,相反贴切地体现了‘以墨为道’的精神,因之也逐步为我和我的弟子们认可了,转而也成为姓了。姓本来是人创造的,我想,为什么不可以以墨为姓呢?这里不妨说一句闲话,我国姓的来源,有的以地域为姓,有的以封号为姓,有的以职业为姓,有的以氏为姓,这里是否可加一条‘以肤色为姓’,‘墨’就是以肤色为姓的。后代中也有以‘墨’为姓的,如明代高陵人墨麟,洪武中以国子生擢监察御史,永乐初升兵部侍郎,他可能是我墨子的后裔了。

客问 插先生一句,关于‘墨’字之解,还有一说,认为“墨”为衣色。先生您及您的弟子们穿的都是深黑色的衣服,久而久之,人们就凭印象称你们为‘墨’了,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答问: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没有什么不对。“锦衣者玉食”,那些嘴里嚼着细软食物的人,身上穿的也往往是色彩斑斓的衣服。服饰与社会地位有关系。“缁衣者素餐”,餐桌上只有素食甚至连素食都吃不上的人,往往衣单衫薄,而且色泽也一定是单一的缁色(黑色,墨色),这也是一种社会地位和社会状况的反映。当年的鲁迅先生蜗居海上时,不就写出了“月光如水照缁衣“这样满含悲愤的诗句吗?因此,揣测(只能算揣测)我和我的弟子是穿黑色衣服的一伙,是合乎情理的。黑脸膛,黑体肤,黑衣衫,如果哪位漫画家

要作“墨子行道图”的漫画的话，那大致的格局倒该是那样的。但是，如果要找文字性的论据，可没有，我在《墨子》一书中可一次也没论及服饰，而黑色的面目及体肤，我倒多次言及。由此可见，上述一说只能作为一说留存，在学术上的价值是不怎么大的。

客问：在先生去世二千余年后，在山东滕州市（古鲁地）举办了首届墨学国际研讨会，确认滕州为先生的故乡，并在那里树立了“墨子诞生地”碑。但是，对先生出生地仍有种种说法，不知先生怎么看？

答问：对我墨子的出生地，说法很多，主要的大致有三说：一为楚人说，一为宋人说，一为鲁人说。下面我想对三说逐一作一点认真的分析，然后表述我的看法。

楚人说。《淮南子·氾论训》有言“：总邹鲁之儒墨，通先圣之遗教。”《淮南子》的作者是武帝时代的淮南王刘安，相去孔、墨已数百年，称他们为“先圣”是对的。他的意思是，儒之先圣孔子、孟子，墨之先圣墨子，都是鲁国人。可是，毕沅在《墨子注》序中，武亿在《授堂文钞》中，都认为鲁人即是楚之鲁阳。如果依此说，不只我墨子成了楚人，连带孔子、孟子也成了楚人了。

我在《墨子》一书中虽未明说自己的出生地，但细心的读者还是可从字里行间见其端倪的。《贵义》篇称“：子墨子南游于楚，见楚献惠王。”如果我从鲁阳出发，“南游”仍在楚地，就不当说“游于楚”，而应写出楚之某一具体地址。只有从北地的鲁国出发，才称得上“南游于楚”。在同一篇章中，又写道“：子墨子南游使卫。”这就更清楚了：如果从鲁阳出发，卫在其北方，该是北游使卫了，只有从鲁国出发去卫国，

才说得上“南游”。另外，《渚宫旧事》记载：“鲁阳文君说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贤圣人也。”这是直接从楚地的鲁阳角度讲的，认为墨子是“北方贤圣人”，这更正确无误地说明我墨子并非楚之鲁阳人，而是北方的鲁国人。

楚人说是站不住脚的。我墨子去过多次楚地，那都是为了调解战事。

宋人说。《史记》有“墨翟，宋大夫也”的说法，《汉书》亦沿袭其说。于是，一些人推而论之，认为我墨子为宋人了。其实，我根本没做过官，终身为一介“贱民”，宋大夫云云，实为道听途说的臆断之言，这一点，将在以后的答问中论及。另外，大夫为先秦时代的一种官名，当时诸侯各国皆有卿、大夫、士三级，后世以大夫为一般任官职之称。司马迁的“宋大夫”一说既没有任何依据，也不涉及何方人氏这个籍贯问题。在春秋战国时期，即使在宋为官，也不妨害他是鲁人或其他国别人。为某国人而去他国当官的，有的是。屈原屈大夫，是楚国人，他不愿放弃故土，一定要当楚官，连司马迁也感到不理解，“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一个“怪”字，说明当时弃国外仕是常事，拘拘于本土，倒是怪事一桩了。这说明，“宋大夫”云云，在籍贯问题上不能说明什么。

我一生中，止楚攻宋是一件大事，有人由此而推断：墨子对宋那么有感情，必是宋人吧！这也是种妄加推断。我听说公输盘正在制造云梯，将助楚攻宋，“子墨子闻之，自鲁往。”（《公输》）可见，我的老家是在鲁，而不在宋。经过一番唇枪舌战，止楚攻宋成功了，归来的时候，经过宋地，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子墨子归，过宋，天雨，庇其闾中，守闾者不内也”（《公输》）。意思是说，我墨子从

楚国归来的时候，经过宋国，天正下着雨，我想到闾门那里去避一避雨，可守闾门的人却不肯接纳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可以提出来：一是“子墨子归，过宋”，这等于说我不是宋人了，我不过是“过宋”，归地是另有所向的。二是“守闾者不内”也是很值得深思的。闾为乡里的别名，古时乡里有闾门隔开，“守闾者”相当于警卫人员。我墨子到宋，连守闾者也不认识我，而且不让我人闾躲雨，可见宋实在不是我的故乡。

鲁人说。这是最贴切的。我可以仅就一件事论证之。《鲁问》有这样的记述：“鲁之南鄙有吴虑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子墨子闻而见之。”南鄙，相当于南郊。是说鲁国都的南郊有一个人叫吴虑，冬天制作陶器，夏天耕耘于田，自比之于圣人舜。我墨子听到了，就赶到南郊去看望他。这一段话看似平淡，实则含义颇为深刻。说明我墨子是居于鲁国之都的，不然，怎么能“闻”到居住在“鲁之南鄙”的一个小人物的消息呢？不然，又怎么能马上“见之”呢？

在诸多学者的论述中，孙诒让的考证最为精到和详尽，他写道：

> 以本书考之，似当以鲁人为是。《贵义》篇云：“墨子自鲁即齐”；《鲁问》篇云：“越王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吕氏春秋·爱类》云：“公输般为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修务训》亦云：“自鲁趋而往，十日十夜至于郢。”并墨子为鲁人之佐证。（《墨子传略》）

孙诒让的说法之所以可靠，那是因为这位学人以事实说话，没有一点想当然。总而言之，我之为鲁人，应当说是清楚的。

客问：世界上趣事无穷，关于先生的籍贯问题，还有一种“外国人”说。起因也是颇为微妙的，就因为先生在《经下》中说过一句话“：通意后对。说在不知其谁谓也。”一些学者由此推断先生为域外之人，不知先生作何解释？

答问 这句话中的‘ 通意 ”,可以解释为‘ 翻译 ”,那么，全句文意可作如是解：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互相对话，不然，对方讲些什么就谁也闹不清了。问题出在“ 通意 ”二字上。一些学者会说，看！墨子与人对话，都要用翻译，他不是外国人是什么呢？外国人才要用翻译呢！

其实，这是一种荒诞的推断。问题在于：是否非得不同国别人之间才用翻译？在古代，交通阻塞，语言不通，就是一个地区，翻一座山，越一座岭，语言也完全可能有所变化。中国地域那么广阔,不同地域的人之间要‘ 通意 ’(翻译)才能‘ 对 ”,也是常理中的事。《战国策·秦策》讲过一则故事：“ 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周人怀璞过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因谢不取。 ”周、郑同在今河南境内，尚且语音语意不同，如进入东南西北更广阔的领域,那更该非‘ 通意 ’不可了。由‘ 通意 ’而断定我是外国人，是武断的。

还有人这样勾勒：“ 墨子之学说，其重要之部分曰兼爱,曰非攻,曰节用,无不与佛学相合。”(胡怀琛：《墨翟为印度人辨》) 由此推断我为印度人。我这里倒不妨反问一句：墨学与佛学有相通之处，胡怀琛先生何不推断释迦牟尼为中国人呢？何不说释氏之学说由墨学传入印度的呢？同为人类，在许多思想上相近、相似，本来就不足怪的，何必作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与唐突之论呢？这种把我当成外国人的说法不攻自破，现已不见于学

界，于此一录，聊博一笑耳！

客问：关于先生的生卒年代，也可说是千古一谜，太史公在《史记》中只是含糊其辞地写下“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这就愁煞了后代学人，考证又考证，似乎总是不得其解，请问：先生可否给我们一大致的答案？

答问：关于我的生卒年代，司马迁说得小心翼翼，连用了两个“或曰”，意思是，他那个时代对我的生卒年代已不尽清楚了，或者在孔子同时，或者在孔子之后。这在当时可能只能这样说。要知道，我们这些被你们称为古人的人与后世不同，那时对生卒年代的记述并不那么详尽，那么精确，只能说一个大致的数据，并寻找一个参照物，用参照物为坐标来确定年岁。司马迁这里用的参照物是孔子，因为孔子是大名人嘛，而且又得到汉武帝的“独尊”，以之为参照效果可能较好。

为了推知我的生卒年代，不少学者充分利用《墨子》一书中言及的人、物、事物，以之作推算，应该说，这是较为可靠的。其中有些说法也许可供读者参考，特录于兹。汪中在《墨子》序中写道：

> 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其仕宋当景公昭公之世，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艺文志》以为在孔子后者，是也。《非攻》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勾践称伯之后，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

孙诒让在《墨子年表》中有些新的说法，他把我墨子的生卒年代又向后挪了一些，他是这样写的：

> 窃以今五十三篇之书推校之：墨子前及与公输般鲁阳文子相问答，而后及见齐太公和，与齐康公兴乐，楚吴起之死；上距孔子之卒，几及百年，则墨子之后孔子盖信。审其前后，约略计之，墨子当与子思并时，而生年尚在其后。当生于周定王之初年，而卒于安王之季，盖八九十岁，亦寿考矣。

二说虽不尽同，但有些方面还是一致的：一、我墨子生于孔子之后，把司马迁说的一个“或曰”——“并孔子之时”——基本上给否定了。在我的《墨子》一书中，大量记述了楚惠王在位时事。楚惠王在位时间是从周敬王三十二年（前 488 年）到周考王九年（前 432 年），孔子殁于公元前 479 年，我墨子活动的年代当在孔子之后，大致可定，而按孙诒让推算，则我当生于孔子后百年，梁启超则认为要靠前一点。二、我墨子卒于孟子之前，这也可以作定论，最重要的证据是在我的《墨子》一书中，连一次都没有提及孟子。如果孟子奔走四方之时，那样激烈地攻击我的学说，我是不会不作出反应的。我一点没提及孟子，只能解释为我与孟子不并时。

这样，虽不怎么精细，但我生活在春秋战国之交，那是肯定了的，也就是公元前五世纪和四世纪之间，至于十分确切的年月，是难以考稽的，也无多大价值。

客问：读史书，记得楚惠王的使者穆贺曾当面说先生的学说是‘贱人之所为’，作为后学的荀子也批评先生的学说是‘役夫之道’。对‘贱人’云云，人们的理解并不相同，杨

荣国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中认为是奴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工匠，先生，请您作一番自我绍介吧！

答问：还是给大家先讲一个故事吧！一次，我从鲁国出发，想到楚国去面见楚惠王，向他游说我的学说。楚惠王对我的那一套不感兴趣，但又不好明说，就以年老体衰为由不予接见，而让楚国的大臣穆贺来见我。于是，我与穆贺之间就有了一段对话：

> 子墨子说穆贺，穆贺大说。谓子墨子曰：“子之言则成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贱人之所为而不用乎!”子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药然,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顺其疾，岂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农夫入其税于大人,大人为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岂曰贱人之所为而不享哉？……昔者汤将往见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问曰：君将何之？汤曰：将往见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贱人也。若君欲见之，亦令召问焉，彼受赐矣！汤曰：非女所知也……（《贵义》）

这段话是明白的，主要是辩论怎样对待贱人以及贱人之地位。我在这里至少讲了三点：一、贱人善言如药，可以治君王之愚。在我看来，比较聪明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贱人们；二、贱人为“大人”之衣食父母,如果贱人不“入其税”,“大人”何以食之？又拿什么东西去“祭上帝鬼神”？三、贱人中有能者、贤者、圣者。汤之礼遇伊尹,亲“往见之”,正好说明了贱人的可贵。

当然，贱人是个复合的层面，是对庶民的总体称谓。我是干什么的呢？请读一读《鲁问》中的这样一段话：

>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 [illegible],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

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 雔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斫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

这段话把我的身份讲得很清楚了：我是一个“贱人”，一个“上无君上之事”的贱人；我这个“贱人”的具体职业是工匠，专以制作车辆为长的木工匠；我的手艺很高，又有相当的文化，因之，被人赞之为“墨子大巧”，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能工巧匠。

客问：对先生一生的行状，资料极少，世代少有人论及。先生能否为我们勾勒出一条粗略的线索来？

答问：由于我是贱人，对自己一生的行状的记述并不怎么重视，因此留给后代人的见诸于文字的东西并不多。但如果苦加搜寻，还是可以见其鳞爪的。

我分阶段说。

第一阶段是少年时期。由于我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就开始学艺了。惠施所谓的“墨子大巧”，这个“巧”，主要是在少年时期学得的。古时学艺不易，如乡里没有能工巧匠，还得打点行装外出，一学至少是三五年。因此，可以推断，我学成之时，已是一个年近 20 的青年人了。这学艺对我一生的事业来说至关重要，没有“大巧”之艺，我墨子就混同于一般的“贱人”了。

第二阶段为学习阶段。学艺有了成就以后，经济也较为宽裕了，于是就去读书，去学文化。一般人是先读书，后做事，我是倒过来了，先做事，后读书，要在我是一个贱人的缘故。读书，读什么书呢？先读的是儒术，投入了孔门。《淮南子·要略训》有一段重要的记述：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鵘。

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背周道而用夏政。

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也许是相当长（有数年时间吧）的过程。先只是学，包括学文化和学“孔子之术”。后来文化上去了，体会也有了，就使我感到孔子那一套事实上与自己贱人的生活实际和秉性格格不入的，于是由“不悦”而“背离”,由‘背离’而持批评态度了。这一段的学习很重要,使我真正懂得了儒家学说是怎么回事，如果没有这个学习，我是怎么也写不出《非儒》那样的文章来的。

不学儒，就去学别的什么，反正学习对我来说是一大急务。《吕氏春秋·当染》中有那么一段：

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在鲁，墨子学焉。

这段话讲的是这样一个历史典故：当年鲁惠公为了表示对周天子的尊重，派鲁大夫宰让去向周桓王请示郊祭、庙祭的礼仪。周桓王派一位名叫“角”的史官前往，惠公后来把他留在鲁国了。他的后代在鲁国繁衍，墨子就向史角的后代学习过。这次学习的内容全变了。正如《汉志》指出的,墨学‘盖出于清庙之守’:“角”为史官之后,以史入手，讲述禹道，这对我来说是得益匪浅的，一定意义上说，禹道奠下了墨学的根基。

第三阶段为收徒讲学。由于我墨子的朴实、爱民，民众也是拥戴于我的。我的门徒不少，至少与孔门不相上下吧！我对弟子们施教“教’的内涵很广,教他们读书,教他们学习生活，还教他们军事知识，“二三子有复于墨子学射者”(《公孟》)。

第四阶段为率徒出游阶段。我墨子的率徒出游与孔子等人有点不同。孔子等人出游除了宣传自己的学说外，还想到什么地方去捞个官儿做做，孔子所言的“学而优则仕”，讲的就是那个意思。我的弟子虽也有仕于外的，但不多，至于我的外出，完全是为了宣传“非攻”“兼爱”思想，当然也有一些行动。

客问：先生与孔子都率弟子四出游说，但从实际状况来说，你们之间又是很不相同的，先生能将这种不同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吗？

答问：我与孔子虽都在周游列国，但周游的目的和游法是很不相同的。对孔子来说，在当时，就有人向他发问：“丘何为是栖栖者与？”（《论语·宪问》）后来，唐代的皇帝李隆基在《经鲁祭孔子而叹之》一诗中，又一次发问：“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而对我墨子，似乎无这样的发问，也无这样的慨叹。

孔子始终是个徒托空言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是人们对他的批评。而我与孔子不同。在周游列国过程中，我与我的弟子一面宣传着吾墨家之道，同时又认认真真地实施着。我们既是传道者，又是行道者。传道与行道相结合。我曾经批评和告诫过我的弟子告子：

> 告子谓子墨子曰：“我治国为政。”子墨子曰：“政者，口言之，身必行之。今子口言之而身不行，是子之身乱也。子不能治子之身，恶能治国政？子姑防子之身之乱矣！”（《公孟》）

我对弟子说的意思是：墨家人必须“口言之，身必行之”。我们口言“兼爱”，同时身行“兼爱”；“视人身若己身”。